

第一章

拯救内乱 初结同心

(1927. 8. —1937. 6.)

第一节 共产党与国民党民主派 共探救中华之路

一、共产党寻找革命的合作者

1921年7月,中国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刚诞生的共产党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去,但还不懂得去寻找同盟军一道进行革命。次年,在上海召开了共产党的“二大”,会上认识到,要推倒军阀,赶走列强,必须组成一个联合战线。他们分析了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小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因遭受极大的痛苦,会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幼稚的资产阶级为免遭经济上的压迫,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斗争;工人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这表明共产党有了统一战线的思想。但又如何去寻找同盟者呢?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仍是去搞工人运动,深入工人群众之中,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不久,这一高潮被国内外反动势力一巴掌打下去了。这个血的教训向幼年的共产党表明,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军。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

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有利于共产党从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斗争天地中锻炼自己。孙中山也接受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广州地区很快形成反帝反封建的中心，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国共两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创办了黄埔军校，革命新局面很快形成。在苏联帮助下，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一年的时间，就解放了半个中国。但是，当时的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已翻脸不认人了，一脚踢开了共产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二、向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打响第一枪

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革命军事专政。这个政权仍然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它和旧军阀的反革命政权在阶级本质上毫无二致，较之北洋军阀的统治更加残暴和凶恶，对全国人民实行极端残酷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这表明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危机的时刻，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派面前，是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取消革命斗争？还是拿起武器，继续坚持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屠刀所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拿起枪杆子，开始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共产党也找到了新的合作者，南昌起义就是这种合作的起点。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是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标志着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但是，从起义的整个历程来看，国民党民主派在起义中表现出重要作用，作出了他们的重大贡献。应该说，南昌起义是共产党领导的，由共产党与国民党民主派共同打响的第一枪。

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这是绝对的，是必须肯定的前提，从起义的提出和决策的过程，到起义成功，都可看得出来，这里无需赘述。

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经过了长期的酝酿与讨论，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议，对南昌起义作了详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都明确决定暴动应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要寻求同国民党左派的联合，竖起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使能担当得起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以反对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的假国民党，要坚持进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政纲，以其三大政策为方法，反对实际上抛弃三大政策而空言三民主义的政客，实行扶助工农、联共、联俄政策。

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不独树一帜，反而还继续扛起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当时为何要这样做呢？一是出于党当时的策略考虑，利用国民党左派旗帜，可以联合更多的人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可以打击和孤立宁、汉两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无疑比单独打起共产党的旗帜会有更大的号召力。二是当时确有一大批反对蒋汪集团的国民党左派存在，他们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确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共产党把他们引入革命的轨道，实行联合和团结的统一战线政策，可以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以完成国民革命。

南昌起义得到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支持，并有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参加。党务方面有：宣传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党务委员会主席张曙时，委员彭泽民等。他们均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郭沫若还是主席团七位主席之一。军队方面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徐铭鸿，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等。这些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不顾个人安危，不受蒋介石的高官厚禄的利诱，断然与蒋汪集团决裂，与共产党一道，迎着反革命逆流昂首奋进，他们在起义中作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贡

献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考察国民党民主派参加南昌起义过程中，我们还不能光从数量上来寻找人数，占了多大比例。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在他们的影响和领导下，广大中下层将领和士兵也参加起义，配合共产党的行动，他们在起义中有不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无名英雄。这部分人同样为起义作了默默无闻的贡献。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强调领导人的作用，也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处理好群众、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给广大中下层将领和士兵以公正的地位。

八月一日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它的内容也充分体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主张。第一、揭露了蒋汪集团的残酷暴行，他们“搜查总理夫人宋庆龄同志、外交部长陈友仁同志住宅，“逮捕中央委员”（指国民党民主派）。在两湖地区被害者，“其一部分为加入本党忠实革命之共产党员外，未加入他党之本党党员数在80%以上，此数万党员，均系根据本党农工决议总理遗训，在农工群众中艰苦工作，今为反动武人如此残杀。”这些杀害国民党民主派的暴徒，“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殊途而同归。”^①第二、提出了要继续遵循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政策。“同人等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宣言中还号召全国广大同志，均应一本孙中山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牌者坚决斗争，尤望在本党指导之下的忠实将士，能一本总理百折不回之勇气，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叛徒所利用，而为本党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②第三、阐明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奋斗目标。我们“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要尽可能，

^{①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载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秕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①另外，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也充分地体现了以上的思想，它说明南昌起义，“是集中各省革命同志，准备第三次北伐，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及卖党苟活的汪精卫等等。”^②这些政治主张充分表达了统一战线的性质，并非共产党一个政党的纲领，还基本上是属于新三民主义的范围。

起义后，新成立的新型政权机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一种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领导机关。8月1日上午，在江西省政府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人员有：起义主要领导人、国民党民主派的中央委员、各省委、特别市和海外国民党党部代表。会议经过协商和讨论，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等25位同志为委员。国民党民主派和不少进步人士参加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工作。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侧举行就职典礼，共数万人参加仪式。就职典礼的礼堂，布置有：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总理遗像和遗嘱。各位委员就职时要恭读遗嘱，向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孙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各位委员就职口号是：继承总理遗志；奉行总理遗训；继续国民党正统；团结革命势力；实行三大政策；实现三民主义；拥护民众利益；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一切叛党叛国的反动派；中国国民党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这14条口号内容完全是国民党民主派的左派色彩，没体现共产党的最高纲领。革命委员会委员韩麟符致词说，“革命委员会是现在领导革命的唯一机关（群众高呼口号，‘拥护革命委员会！’），我们现在只要真正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就不难把所有的一切反动的势力肃清，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载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② 贺龙告全体官兵书。载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3日。

我们现在有我们唯一的领导者，就是今天在座的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群众又高呼口号：“拥护革命委员会！”）。我们要他们的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总有成功的一日。”谭平山委员也在会上急呼，“革命委员会就是革命的新的领导机关，一切党务、政治、军事，都隶属于委员会指导之下，兄弟相信这个新的革命领导机关，在最近的将来，必为全国革命的民众所拥护而为唯一的革命领导机关。”^①起义总指挥贺龙指出，只有革命委员会才是我们革命同志的领袖，才是革命政权所寄托的地方。革命委员会的性质不单纯是工农政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工农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民主派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权机构的组成人员，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

以上史实说明，南昌起义不是共产党单独的行动，而是与国民党民主派合作的成果和结晶。

三、继续寻求救国之道

南昌起义失败后，共产党在继续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国民党民主派也走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他们大都没有由失败而丧失革命信心，还是在继续寻找救国之道，只有少数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脱离了革命队伍，但几年以后，又投入到反蒋抗日的洪流之中。

（一）共产党开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贺龙、郭沫若等国民党民主派，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一起探索救国之良方，继续坚持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拿起枪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广大的乡村发动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从此，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帜，由共产党独立树起旗帜领导工农大众进行斗争。从1927年秋到1929年底，共产党先后在全国各地举行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出现了群

^① 革命委员会委员讲话，载江西工商报，1927年8月3日。

雄四起的局势。这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围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保存了一部分武装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还逐步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建立工农武装和政权，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到1930年初，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总结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是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结果，它完全符合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条救国救民之道也只有共产党才能找到，其他党派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二）国民党民主派的艰苦探索

面对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不光是共产党在继续寻找革命道路，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也在进行艰苦探索。他们这些代表人物都是反蒋爱国人士，没有与共产党一道搞武装起义。但是，他们也在积极开展反蒋斗争，也在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其杰出代表。从共产党内游离出去的一部分人，也投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左派领袖一部分出国寻找真理，学习研究革命理论，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另一部分在国内秘密组织新的政党来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邓演达、宋庆龄先后到达莫斯科，希望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左派能够给以提携和援助。在此前后，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声明，其主要内容为：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有力地谴责了蒋汪集团的背叛行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应当是中国革命的指针，是继续进行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认为起义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还预见这星星之火，可以遍布全国各地；断定中国共

共产党无疑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①他们还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号召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继续与蒋汪反动派集团作斗争，建立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新三民主义。^②宋庆龄断然拒绝参加蒋记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更严辞拒绝赴南京做官，而是继续赴法、德等欧洲各国，潜心读书，深入研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邓演达也在德、法等国学习革命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认真思考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

在国内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和一些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包括被共产党中央不适当地开除党籍的一批人），他们确定继承孙总理遗志，于1928年春，由谭平山等领导，成立“中华革命党”。该党除活动中心上海外，还在北平、天津、江苏、四川、江西、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发展了组织。他们所办的《突击》、《灯塔》周刊，以及未发表的《宣言草案》表明，中华革命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和反蒋介石集团的，有时也错误地批评了共产党，但仍然把共产党作为有条件的“愿与之合作”的政党，幻想在国共两党之间奋斗。邓演达回国后，1930年8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重新举起反蒋的旗帜。邓演达为其撰写和起草的一系列宣言、文件等，阐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特务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蒋家王朝投降帝国主义、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与野蛮狠毒的屠杀剥削，较之北洋军阀更为残酷，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已经变成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只有推翻南京反革命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力量，实行耕者有其田

① 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9月17日·宋庆龄·中国目前的形势·载为新中国而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②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载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的主张，国家和人民才能得到拯救。他们还郑重宣布：要救中国于危亡，救人民于灾难，必须推倒南京反动统治。推倒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民贼与独夫，推翻南京反动统治，是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的天职，也就是本党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是进步的，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有相似之处。

他们主办的刊物中也登了一些反对共产党的文章，不同意共产党的主张，认为“共产党纯粹是国际的”，不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对症的药方”等等。他们还认为“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胁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使农工的利益都确实得到保障，使工农的利益能够平行的发展，用这种方法建立平民的政权。共产党只盲目地追求未来的空想，我们却要把历史现阶段上的要求得到解决。因此，共产党在目前要使中国社会更贫乏混乱化，我们却要使中国新的社会秩序早日形成。”^①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不属于共产党或其他派别，而是属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策划倒蒋。邓演达在该党成立大会上就提出“军事第一”的口号。不久，主办干部训练班训练干部和秘密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该会组织遍布全国，会员人数和受到这一组织影响的黄埔学生近6000人。邓演达还在国民党嫡系部队和地方势力中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发动起义。到1931年8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就绪，邓演达不幸被叛徒告密而被捕，11月蒋介石将邓秘密杀害。邓演达的倒蒋计划也落空。

邓演达的思想和行动表明，他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复兴中国之路。他不同意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误解了共产党的最近目标和最终纲领，不知道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片面

^① 1930年9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1930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言，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应属于他所领导的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些都是明显错误的。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邓演达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我们应该对他进行批评斗争。^①

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肯定邓演达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像共产党一样，也在继续寻找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他赴苏联、德国等地学习和考察，也是为了寻找真理。只不过他没有真正找到救国救民之道。他这种可贵的求索精神应该称颂，这是一种不成功的探索，要允许有不成功的探索，因为当时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靠国民党民主派和共产党去探索。这也说明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是艰难曲折的，是付出了重大牺牲的，包括了国民党民主派邓演达等亦在其中。更好地说明了共产党伟大之所在，自身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再伟大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以邓演达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走第三条道路来批判他如何反动。如果这样，那是一种简单的办法，不是对历史的慎重态度。苛求于他，要他达到共产党的程度是办不到的，他当时的认识只能达到这个地步，达到了这一步就相当不错了。假如邓演达没有被害的话，按照他的这种可贵精神发展下去，他经过失败以后必然会像其他国民党民主派一样，会与共产党合作的，最终会达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九一八”事变前，这一阶段共产党与国民党民主派之间还谈不上是党派之间的合作。南昌起义时的合作也不是整个国民党民主派都参加了，还只是一部分。起义失败以后，国民党民主派把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当作“复兴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进行了反蒋宣传和行动，这在白色恐怖下，使共产党多了一份反蒋力量，多了一个帮手。按理而论，共产党应视他们为友党派，进行联合，利用其积极因素。周恩来在“关于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67

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曾肯定，在反对蒋介石问题上共产党仍应与第三党进行合作。^①但是，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导致了中共没与国民党民主派直接合作，还把他们视为敌人，所以，只是客观上双方起了相互配合的作用。这种配合式的合作还处于合作的胚胎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还处于配合状态，原因主要是：蒋介石反动派集团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不仅大批屠杀共产党人，而且也不放过真正的国民党民主派和进步人士；蒋介石不允许共产党存在，也绝不允许别的党派出现。这就使得党派之间的合作难以实现。另外，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把一切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统统把他们推到敌人当中去，否定了与其合作的可能性。从国民党民主派本身来看，有不少人也片面理解共产党，分不清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从而，导致了当时的那种不理想的合作局面。

第二节 共产党与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 共兴抗日民主运动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民主派进行武装抗日反蒋斗争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的紧要关头，抗击日寇成为中国人民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和普遍要求。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严厉斥责和反对日寇的侵略行径，并揭露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同月22日，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提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66，182。

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的号召。^①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斥责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地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无耻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国！”1932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又发表了“对日宣战通电”，正式宣告对日作战，提出了“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②与共产党相反，国民党反动派在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时，它仍然采取“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极端反动的政策，在国内加强了法西斯特务统治，致使祖国大好河山一再陷入敌手。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极为不满，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一道，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共产党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

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曾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党爱国民主将领蔡廷锴，时值驻防上海。他率领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寇的侵略。在这紧急关头，共产党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把上海各界人民发动起来，支持和援助十九路军的抗战爱国行动，号召工入阶级和各界民众，组织多种形式的义勇军，开赴前线作战。上海市总工会义勇军2000余人，由总工会委员朱学范等率领，与十九路军司令蔡廷锴接洽，请求开赴前线作战。^③同年2月份的《申报》上还刊登了大量义勇军参战消息，市总工会组织邮工、水电木工等工界义勇队；市民联合会各区组织多种义勇军参战。随营学生义勇军后来编成三个大队，参加者大都是当时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担任战地勤务、后方宣传、建筑防御工事等工作。有的学生义勇军还直接参加战斗，且作战英勇，在战斗中受伤者众，不少还战死沙场。上海市总工会

① 红旗周报（18），1931年10月18日。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内部版）。

③ 上海申报，1932年1月31日。

还号召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发表抗日宣言，组织海员、码头等业工人拒绝为日军服务。在日本轮船上工作的华人职员举行罢工，船工、司机拒运日本军火；汽车工人拒修日本汽车。^①蔡廷锴的回忆文章，也充分肯定了中共地下组织对十九路军的援助，有力地配合了前线作战。比如，军队在前线冲锋时，需要大量手榴弹，我们请军政部发给被拒绝时，就由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方供应使用；凡是前方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连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组织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输送。^②蔡廷锴认为，共产党组织的各种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对十九路军的抗日，起了积极的有效的作用。^③张治中率第五军于2月中旬参加淞沪抗战，在庙行、浏河、葛隆镇战斗中抗击日寇。应该说，十九路军打破日寇在4小时内占领上海的黄粱美梦，与第五军一起苦战四月，致使日军三易主将，死伤亦有万余。这些战果，与共产党的号召、鼓动、策划援助等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共产党的行动，与蒋介石集团形成了鲜明对照。蒋介石在事变前，不许抵抗；事变后，又在幕后策划对日寇妥协，不给十九路军枪弹和军饷，对日军无耻妥协，最终签订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协定。

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也是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发挥重大作用的。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是共产党促成的。“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将军主动靠拢共产党，通过其部属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中共中央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认为，冯将军属于在野的失意军人，有抗日爱国热情，不同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当局。因此，他根据

^① 上海申报，1932年2月1日至28日，尤其是3日，11日，28日消息。

^{②③} 蒋光鼐，蔡廷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中共中央特委陈赓等负责人的指示，与冯将军建立了正式关系，运用冯将军的社会政治影响，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1年11月吴成方还派共产党员肖明（1926年冯访问苏联时肖明曾作过他的翻译）等人去山西汾阳与冯玉祥晤谈。肖明向冯将军说明了北方特科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了用抗日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收复失地的政治主张。同时，还相应地采取了适宜的策略口号，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提打倒蒋介石、其他杂牌军阀和英美帝国主义等。这些政治主张和策略口号后来就成为冯将军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政治纲领。此次肖明与冯将军的面晤，对他很有影响，他的思想豁然开朗，情绪也很激动，承认了他在1927年叛离革命，加入反共行列的错误。他悲伤泪下，态度真诚，并表示以后能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做些工作。此后，冯将军同中共北方特科建立了正式联系，确立了在抗日旗帜下的合作关系。稍后，冯将军得知上海的中共中央缺乏通讯工具，就主动卖掉北京的一所房子，买了一部电台，经北方特科转赠中共中央。1932年冯将军还介绍吉鸿昌将军同中共北方特科建立了直接的工作关系。1932年夏，北方特科同冯将军商定，以张家口为进行抗日军事活动的根据地。10月，冯将军移居张家口。1933年初，北方特科还派共产党员张存实、武止戈、许权中等，帮助冯将军做军事方面的工作，又派张金刃（化名张慕陶）等人去做政治工作。随后又派了宣侠父、王霖、赵作霖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达张家口，协助冯将军筹划和组织抗日同盟军。到1933年5月，在冯将军周围工作的共产党员有三百人左右，他们进行了合理的分工，张金刃代表特科同冯将军进行联系，专事上层统一战线，直接为冯将军谋划同盟军事宜。吴化之（化名吴大农）负责联系在华北的由党领导和控制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的工作。武止戈则派往蒙古，以打通与苏联的关系，求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这些共产党人与冯将军、吉鸿昌将军等，共同招集西北军旧部的爱国将士，收编从东北退至察哈尔的抗日义

勇军，以及察哈尔省各地自卫军等抗日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特科负责人吴成方从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后，来到张家口，决定揭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由于共产党人的大量工作，并与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的协商，终于在1933年5月26日，由冯玉祥将军通电全国，公开宣布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坚决表示：率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这样的号召，使活动在长城一线、东北、华北、西北、内蒙古和中原等地的抗日武装力量，以及北平、天津等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纷纷响应，奔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

共产党员在同盟军中起了核心作用。第一，一批共产党员担任了抗日同盟军的军政职务。张慕陶、宣侠父等为同盟军军委会的常委，张慕陶还出任同盟军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为第18师师长。第2师的三个团长尹心田、贾振中、周茂兰都是共产党员，营、连、排长也大都由共产党员充任，他们有：张公干、赵进先、李启明、冯洪国、朱大鹏、陶汉章、王浩和、李汉章、王洁清、王介夫、张涛、赵力钧、胡一廷、周茂繁、周秉忠、马继增等。冯将军的机要随从王华锋和王大用也是中共党员。第二，在1933年5月底还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中共河北省前委。这是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组织，它的半公开活动机关是“察哈尔省御侮救亡会。”前委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察哈尔工农兵群众的抗日斗争，开展群众性抗日的游击运动，并与蓬勃发展着的河北各地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配合南方苏维埃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行动，创造北方的新苏区与红军。具体原则是按照中央指示，扩大革命战争，向南发展，争取在蔚县涞源地区首先建立察南根据地。前委开展了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工作，召开察哈尔御侮救亡民众大会，动员工人、农民、市民、士兵、学生参加大会，宣传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察哈尔省。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的“察哈尔省御侮救亡会”，领导新光剧社，

演出抗日救国戏剧；指导各救亡团体到工人和学生中讲演；深入各铁路、电灯、汽车工会中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在学生中组织抗日募捐队、宣传队、童子军等。共产党还掌握了改组后的省政府报纸《国民新报》，并以救亡会的名义主办了《民众日报》、《抗日战线》、《老百姓报》（陈伯达负责主编《老百姓报》）。这些报刊对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工人、群众加入抗日同盟军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抓好了舆论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认清了抗日是唯一出路，所以，在同盟军成立后一月余，队伍就迅速发展近十万人。同盟军在收复察东失地之时，前委组织了三人团，并带领十余名宣传队随军出发，在战斗中，组织运输、筹措给养、修理武器、救护伤员等方面的工作，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第三，军事战斗中，共产党掌握的军事力量二师、五师、十六师、十八师均为作战主力部队。宣侠父在收复察东失地时，不仅随军行动，还身先士卒，组织军队政工人员进行战地宣传，鼓舞士兵英勇作战，发动群众支援同盟军，最终使日军狼狈逃窜，收复宝昌、康保、沽源三县。接着又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收复了察北重镇多伦。不少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为抗日流出了鲜血，还有象武止戈这样的高级领导人。第四，共产党员在抗日同盟军干部学校中起了核心作用。当时全国各地抗日爱国知识青年踊跃到张家口参加抗日救国队伍，为了安置和训练这些青年，共产党与冯将军研究决定，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干部学校，共产党员张克侠为副校长（张为冯将军的连襟），还委派汾阳军校优秀学生韩庄、赵力钧（都为共产党员）为队长，对来张家口抗日的知识青年进行军事训练。这些学员经过短期培训后，有的被派往部队作政治工作；有的作为吉鸿昌领导的教导队，随第五师行动，做战地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都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工作出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当抗日同盟军打击了日伪军，取得收复失地的胜利之时，蒋介石竟在南京胡说，冯玉祥是“冒名抗日，实行割据”，并调兵遣将，向冯将军进逼。冯将军面对此况，暴露出他对蒋介石的妥协

性和软弱性，先是发出通电，否认有赤化之举，但通电宣布取消同盟军政治部，禁止宣传队出外演讲。还下令让警察封闭了《民众日报》等报刊。最后在八月中旬还宣布取消同盟军番号，自动离职下野。在此以后，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还继续与吉鸿昌、方振武将军树起抗日旗帜，直到蒋介石与日军一起联合夹击二位将军的部队，弹尽无援为止。后来，吉鸿昌还执行共产党的指示，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帝统战工作。

共产党与福建人民政府实现了—定范围内的联合，公开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帜。

早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前，十九路军领导人已感到只有积极进行反蒋，推倒蒋介石反动统治，才能促成全国一致抗日救国；而要反蒋抗日，必须与共产党联合起来，一同作战。十九路军主力区寿年部在与彭德怀的东方军交战时，连战皆败，受到重创，军事上失败促使十九路军作出联共抉择。于是，十九路军主动派代表陈公培（即吴明，乃中共秘密情报人员），携带蒋光鼐写在绸布上的“与红军联络证明书”，给前线与红军联络，东方军在接待陈公培后，即电告中央。周恩来回电并指派袁国平前往西岸与陈公培接谈。1933年7月，陈公培正式与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等在东方军王台指挥部隔邻之八角亭里会谈。最后，彭德怀代表红军致信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对他们所领导的军队响应共产党《共同抗日三条件》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同时对十九路军以往的反共和压迫人民的行为，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0月，中共方面决定派潘汉年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由陈公培陪同）在瑞金谈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多次接见了徐名鸿、陈公培。最后，双方全权代表草签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初步协定》，明确指出：“双方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每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的

军事同盟。”^①该《协定》签订后不足一月时间，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不久，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张云逸及福建省代表方方与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谈判，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明确划分了军事疆界线，解决了双方人员接触的安全与交通问题。共产党还派出潘汉年等代表驻在十九路军总部里，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就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双方还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红军开辟了一条由中央革命根据地闽西到达闽南的沿海贸易通道，进口了大量食盐、西药、布匹、硝酸等急需品，解决了后勤供给方面的不少问题。在军事上，由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力主予以十九路军援助，所以，中共中央委派张云逸为军事联络员入闽，以加强双方的军事联系，便于合作。另外，派红军主力部队东方军由头陂一带出发，追击在光泽、邵武方向的两个师的蒋介石围剿军，不久，又包围了沙县。工农红军的这些军事援助，没有得到十九路军的密切配合，终至败局无法挽回。到1934年2月双方的合作关系最后终结。

福建人民政府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公开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这无疑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②他们是从国民党军队中第一批冲杀出来的联共反蒋抗日的队伍，不过，这时的联共，还只是初步的，是很不巩固的。共产党和福建人民政府只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很多重大问题还处在谈判中。这次合作的特点是：第一，合作双方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当时共产党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而福建人民政府则实行资产阶级纲领。双方不是像国民革命时期那样，以新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第二，双方的合作没有一个合适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红色中华，1933年10月2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147。

的组织形式。国民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是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各革命阶级的民族民主联盟。而此次的合作，缺乏一个固定的强有力的组织形式。第三，双方的合作，当时本质上是两种武装力量的初步联合，即红军与十九路军的联合，所以，主要是军事上的联盟。但是，双方又还没有签订正式的具体的军事协定书。只是双方全权代表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共十一条。此协定只是原则上作了双方合作反蒋抗日的规定。因之，在蒋介石的武装进攻面前，没有协同的军事行动，便于蒋介石的各个击破。蔡廷锴后来总结教训时说，十九路军和工农红军没有订立攻守同盟，是闽变失败的原因之一，这切中要害之谈是很深刻的。所谈这几点，也是福建人民政府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

二、共产党与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争取民主救国

在国民党军队内一批爱国将领发动武装抗日反蒋的同时，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派也开展了非武装的民主救国运动。他们为抗日救国，争取人民民主而奔走呼号，掀起了一次民主高潮。在这个运动中贡献最大的是宋庆龄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1981年6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致宋庆龄悼词中，对“同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作的贡献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①

第一，“同盟”参与营救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夫妇。营救牛兰夫妇的秘密计划是共产党中央保卫部门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上海站共同制定的。中共负责此项工作的是中央联络员潘汉年。营救活动采用公开和秘密两种方式进行，潘汉年带领共产党的情报人员，通过各种特殊内线关系，了解到牛兰夫妇的

^① 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切情况，证实了确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潘汉年通过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邀集宋庆龄等33人组成“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与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进行合作，他们均以公开的方式进行营救活动。“同盟”领导人多次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的主要人物汪精卫、居正、罗文干等，要求国民党当局按照法律程序，给予牛兰夫妇以公开审判，并允许其自聘律师为之辩护；如果法庭辩论后证据不足，请望予以释放；不得长期秘密处置牛兰夫妇。“同盟”得知关押牛兰夫妇的监狱后，还指派医生去监狱为牛兰夫妇治病，设法将牛兰夫妇的孩子送到苏联。宋庆龄等一行亲赴南京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迫害罪行。这一系列活动引起社会强烈震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下屠刀，从而也保护了牛兰夫妇的生命。^①

第二，“同盟”先后保护和营救了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政治犯。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陈赓、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谭国辅、丁玲、潘梓年、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等。“同盟”在报刊上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真相；向蒋介石、宋子文等当权者发表电文，强烈抗议他们的法西斯暴行，要求予以释放；公开组织营救委员会，以特殊身份同国民党高级官吏据理力争；派代表团到监房去了解政治犯被虐待的情况，宋庆龄曾亲自到阴森霉臭的牢房里去看望陈赓，并在幽暗中为共产党秘密地转交了一张纸条给陈赓。^②由于“同盟”的营救和保护，与共产党配合进行斗争，所以，像陈赓等共产党员终被营救出狱，不少爱国者出狱后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同盟”还与共产党一起联合一些爱国进步团体，于1933年6月组建了“中国领土保障同盟。”

第三，调查北平监狱，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

^① 陈漱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31-37

^② 文汇报·1983年9月10日·第3版。

迫害。1931年底设立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这里囚禁的政治犯中，大部分是天津、北平两地被捕的共产党干部，也有其他政治色彩的犯人。监狱对政治犯施展了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的反革命两手，犯人戴上3斤至6斤重的大脚镣，致使大部分犯人得了关节炎，有的甚至瘫痪。粮食被层层克扣，吃的是掺砂米饭和白水菜汤，使不少人患有肠胃病。监房阴暗湿臭，拥挤不堪，夏日如蒸笼，冬日如冰窖。有人因监房黑暗而双目失明。政治犯没有阅读书报的自由，犯人亲友送来的近于油滑的章回小说《何典》也被当成共产党的书刊予以查抄。当局还派牧师入狱说教，妄图以出狱为钓饵，诱使政治犯悔过自新，背叛革命。监狱的共产党秘密支部对此进行了合法斗争，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刘尊棋请求秘密支部负责人杨献珍、薄一波、刘澜涛等，可否由刘尊棋写信给宋庆龄，揭露监狱对政治犯的残酷迫害，呼吁改善待遇、出狱抗敌。1933年初，刘尊棋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的名义写两封英文信，买通看守人送给宋庆龄。此信经辗转送到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31日，宋庆龄委托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利用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之机，到北平监狱调查实情，进行营救活动。杨杏佛来到草岚子监狱刘尊棋牢房的窗口时，特意停下来，叫他的名字，用英语问他是否给宋庆龄写过信，刘说有此事。杨杏佛说：“我就是奉孙夫人之命来视察北平政治犯监狱的。”杨杏佛一边点头，一边用同情的口吻说：“我们知道你们无辜。我们一定促请当局改善你们的待遇。”在这次视察过程中，杨杏佛向在押政治犯宣传了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指出值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全国人才应不分党派，集合在抗日救亡的同一战线中。视察结束前，杨杏佛还要求张学良的外事秘书王卓然向天津军政当局转达了宋庆龄关于举行政治犯大赦、释放爱国青年的要求。2月1日，民权保障同盟举行记者招待会，宋庆龄签发了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的两封来信。2月6日，杨杏佛向民权保障同盟总会报告赴北平调查经过，揭露了监狱瓦破檐穿，空气恶浊等

黑暗状况，更指出“北平监狱内政治犯多未经司法手续”，“其间当有不少冤抑者。”2月11日民权保障同盟机关报《中国论坛》二卷一期全文发表了这两封信的中文本。同期还刊登“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一文，指出：被捕的革命者，都是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仅仅他们那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及自我牺牲精神，就足以把侵略者驱逐亚洲之外；为解放这些英勇的战士，所以应该高呼：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由于民权保障同盟的舆论压力，张学良在奉命出洋考察之前，无条件释放了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刘尊棋等少数政治犯。

从民权保障同盟以上几件事实看，它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下的反蒋斗争，真不愧是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朋友，同盟真正是为了保障中国人民民权的政治团体。

这个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合作没有多大区别，基本上相同，仍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还不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共产党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左派合作得较好，也一般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同盟本身还不是一个政党，是一个进步的爱国的政治团体，内部思想状况较复杂，斗争较激烈，个别领导人还被蒋介石的屠刀恐怖所吓倒，辞职而去。民权保障同盟不足一年也被迫解散，与共产党的合作也随之结束。这个阶段与第一阶段合作所不同的是，共产党在抗日民主运动中与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有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共产党员还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一阶段除了南昌起义外，还是处于客观上相互配合的作用。这个阶段在主观上都有了一定的合作意识，客观上也达到了一定的合作效果，取得了一些成绩。

此时没有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进行很成功的合作，与共产党中央当时的左倾错误路线也有关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没有认识到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变化，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把同国民党

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断定为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如：1933年7月17日“中共给北方代表田夫同志信”中，把吉鸿昌将军仍然看成是一个军阀，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敌人。当时中共中央还一再指示“中共抗日同盟军前线委员会”，要警惕冯玉祥不可避免地叛变，要防备冯玉祥向我们进攻。这些错误政策使共产党没能够实现创建华北红军和华北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目的。然而，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对此吸取教训，以致在1933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出现时，又重复了同样性质的错误，一再延误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失去领导中间势力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作斗争的中心地位。这一深刻教训毛泽东后来是反复说明了的。

第三节 民主党派支持共产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一、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为了战胜日寇的侵略，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立广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并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布了《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野心，指出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形势，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主张。其核心是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袖的反蒋抗日统一战线。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首次发表。^③并经各方面的努力，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锁禁会，秘密传入国内。同年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了“八一宣言”的思想。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此次会上，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它对当时国内外的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党的政策，作了完整的分析和决定，指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而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①决议还特别强调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并告诫全党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的右倾错误，要求全党在新的环境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进一步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说明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由于两面性的特点，决定他们在新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有改变政治态度的可能。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内部版）。

分别的。它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其中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的那一部分，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因此，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泽东还指出，即使是始终与人民为敌的地主买办营垒，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的形势下，也可能产生分化，不会铁板一块。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形成了地主买办阶级内部各个集团分别依附于不同帝国主义的特点。因此，当民族危机加深，当斗争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种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斗，对革命人民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用。^①

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不仅武装了全党，而且在国内迅速传播开来，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主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原来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天津、北京党组织，以及军委系统，立即遵照这些精神，积极在上层和文教等领域，开展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提高了民主党派领导人士的认识和思想水平，指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新航向，推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

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最先 响应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分别在德国、日本、香港等地看到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144—148

都受到了很大鼓舞。他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实行联共抗日，要联共，就必须立即组织起来，以便同共产党和全国抗日力量结成反日阵线。为了适应抗日的形势，他们把自己的政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在香港九龙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上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发表了《告同志书》文告，尔后又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①其中，《告同志书》被认为是在中国最早响应共产党“八一宣言”的一个宣言。^②这些文件的主要思想与“八一宣言”基本相同：客观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凭借自己的武力，夷中国为其完全的殖民地的严重危机，认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的生路，就是在民族革命战争的血泊中求生存”，就是要首先对日作战；要取得抗击日寇的胜利，必须组织反日阵线，“一切革命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关键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导机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们还主张恢复联俄联共的政策，承认苏维埃是其现在区域的政权形式，红军应与全国反帝的军队和人民取一致的行动，共同对日作战；要像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那样，与苏俄联合，还要同世界上反美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民众结成联合战线；全国要在抗日的前提下，迅速召集全国人民非常代表大会，成立人民会议，保障人民基本权力。^③这些思想表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重大转变，由过去反蒋排共转为抗日联共反蒋，他们的这一进步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不少党员还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密

① 中华论坛第10—11期，1945年12月1日出版。

② 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农工民主党，1948年10月延安出版。

③ 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285—

切配合斗争。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等处合办了五六种刊物，宣传抗击日寇的主张。在上海，他们和共产党在霞飞路“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八仙桥青年会馆组织了“抗日歌咏团”，吸收约6000学生和店员参加，用歌咏的形式表达抗日的主张；他们还在一些纱厂和烟厂建立读书会、俱乐部等群众组织，印发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在广东，他们公开创办了《南针旬刊》，发表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进步主张。

这个时期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也还存在不足之处。第一，他们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第二，对外则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第三，在国内提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毁灭现存的土地制度的政策。这两项政策不利于组成国际反日统一战线，也不利于建立国内的统一战线。这比共产党的政策还“革命”。这种认识不利于调动国内外的一切力量来抗日，忽视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抗日的可能性。共产党提出的减租减息政策，不反一切帝国主义，只反日本法西斯才是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西安事变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才放弃了反蒋的口号，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联蒋抗日的口号，这一反蒋口号的放弃，标志着他们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是他们的一个重大进步。

三、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的帮助下，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开始克服自身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准备回国联合各种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上半年，代表团委派中共党员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人在香港进行秘密活动，推动原十九路军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等建立抗日反蒋的政党。在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帮助下，李济深、陈铭枢等便于1935年7月在香港召开会议，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同年12月，大同

盟对外公开发表了他们的政治宣言，“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目标，并提出了八项具体的行动纲领：第一，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革命；第二，策动全国海陆空军武装全国民众对日作战；第三，收复失地；第四，推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事；第五，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一切汉奸财产；第六，联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七，铲除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第八，争取人民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绝对自由。

大同盟不仅竖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还明确提出了“联合战线，武装抗日”的口号，呼吁各党派、各民众团体都应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捐除一切成见，站在民族抗战的前线，发动全国民众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指出了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是，抗日反蒋是民族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任务”，“抗日如不打倒蒋介石，决不能收抗日的实效”，“倒蒋而不抗日，也决不能实际倒蒋”。^①这是因为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劣绅的政权，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它有极强的奴隶性与附属性；日本帝国也早就希望蒋介石政权成为它的永久性走狗。基于此，大同盟告诫中国广大民众，“只有团结于反蒋抗日的旗帜下，以无畏的牺牲精神，用鲜血头颅才能换得民族之独立解放。”^②大同盟的这些主张正中时弊，切合当时的实际，反映了当时一般老百姓的心愿，也击中了蒋介石反动派的痛处。他们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思想是一致的，认识水平也不相上下，都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抗击日寇，救亡图存。把抗日与反蒋并提，视为同等，共产党也持此说，后来才

^①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对时局宣言。1936年1月4日救国时报。

^②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学生爱国运动告同胞书。1936年2月24日救国时报。

放弃了反蒋口号。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后，共产党鼓励和支持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派胡兰畦经常在香港参加他们的活动。1936年春，陈铭枢赴莫斯科进行联苏活动时，胡兰畦是随行人员之一。李济深还委托胡兰畦带去了一封“给中共代表致敬的信”，此信在巴黎由胡兰畦亲手交给了正在巴黎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①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替陈铭枢等安排了住处，设宴招待了陈铭枢等人，并与陈进行了多次会谈。“两广事变”发生后，陈铭枢回国，路过巴黎时，在旅居巴黎的共产党人的安排下，陈铭枢应邀在巴黎华侨召开的抗日救国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激起了旅法同胞和华侨的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热情。^②

在1936年9月，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分别致函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并派专人送达，向他们介绍中共于1936年8月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最新主张，同时送交中共方面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互相合作，唤起民众，实行对日武装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等。^③在他们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领导人认真讨论分析了时局，根据国共合作的精神，放弃了“大同盟”原先的反蒋口号，提出了新纲领，即：第一，召集人民救国会议，讨论救国方案；第二，组织抗日国防政府，成立全国抗日联军；第三，随时随地武装民众，发动自发的全国抗日战争；第四，释放救国的政治犯，争取救国的一切自由；第五，恢复十九路军，扩大民族抗日阵线；第六，厉行保护国产，彻底肃清仇货；第七，实行抗日的教育，发扬民族精神；第八，联合国际友人，保障中国领土完整。^④与此纲领发表的同时，1936年10月陈铭枢“致蒋介石

①② 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97，304

③ 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70—75

④ 在抗战旗帜下，团结报，1980年9月12日。

电”文中，还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认为全中国“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战，非全国抗敌无以图存”，并表示愿为“国共合作救亡”负斡旋之责。^①这些内容表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改变了成立时的反蒋口号，只举抗日旗帜，这与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完全配合了共产党逼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应该说，大同盟的这一进步，是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对他们极大影响的结果。

四、救国会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在共产党的《八一宣言》鼓舞下，邹韬奋在文化界积极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1935年11月30日出版的《大众生活》指出：“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华北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整个问题的一部分”，要求“动员全民族大众的集体斗争的力量，共同起来为着整个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战。”在此不久，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于12月12日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示对国事的深切忧虑和救国决心，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成立任何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等八项主张。他们还坚决表示支持北平学生“一二九”大示威的爱国政治运动。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第二次救国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抗日救亡主张。同时，还成立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等组织。于是在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来创办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作了大量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并结合各种纪念日多次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爱国的示威游行，推

^①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救国时报，1936年10月25日。

动了上海以及全国各地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在全国各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中，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为常务委员。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初步政治纲领”，全面阐明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野心，尖锐批评了国民党当局对外妥协退让，对内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认为救国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促成全国各党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国活动，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了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活动，推动与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等在《生活知识》上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它以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希望的方式，抨击了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指出：“蒋先生屡次主张以先安内后攘外的方式准备抗日，不管这主张对不对，但是，五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的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上并没有片刻停止。”他们希望国民党从大局出发，消除过去之成见，联合各党派特别是共产党，一致抗日。“公开信”还对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给予高度评价，并明确指出，“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这一政策，而且相信这一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共产党对此信立即表示支持。8月10日，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称颂“公开信”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表示完全赞成，完全支持。“公开信”的内容及各界的反应，使国民党中央十分恼火，它不是立即反省和改变其错误政策，反而给他们加上了“有意为共产党张目，并削弱民众对于政府及国

民党之信仰”的罪名，^①而成为逮捕“七君子”的理由。

这个阶段合作的特点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有了合作的萌芽，主要表现在，解放行动委员会和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纲领，部分地接受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并发表了与共产党基本相同的纲领：共产党的爱国行动和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有了新的看法，主张联共抗日。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前进了一大步。在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为往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这个阶段的合作主要还是处于理论纲领上的合作，具体落实到行动当中去的东西较少。这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综观这十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特点看，还不是党派之间的合作，还是临时的、松散的合作，是个别问题上的合作，与少数爱国民主人士之间的合作，与个别团体之间的合作。到1935年底，才有党派之间的合作，但只是处于萌芽阶段。这个时期合作也不太默契，主要还是客观上起了相互配合的作用。一些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开始时对共产党有所误解，有所批评，甚至在思想理论上反对共产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之伟大被他们所逐步认识，终于走上了联共的道路。在民族危机时刻，还不记蒋介石的仇恨，放弃反蒋旗帜，争取蒋介石集团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是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推动分不开的。

不过，这个时期共产党与部分国民党左派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合作得较好，如朱庆龄等，始终站在共产党一边，为抗日和民主而奋斗。

总之，这十年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初步合作，到了抗日时期才有了密切合作。

①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对沈钧儒等人）起诉书，1937年4月3日，转引姜平著，中国民主党派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101